

新中国70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

张翼

内容提要 社会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规模的增长与就业区域的变化,继之出现波澜壮阔的城镇化与三次产业结构从业人员的梯次推移,最后发生了住房面积的扩大与阶层结构的优化。伴随人力资本的提升与社会流动渠道的拓展,中国也划时代地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从贫困社会转变为小康社会。这一系列发展结果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国人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与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中国在整体上已经从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阶段转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也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预期寿命阶段转到高预期寿命阶段。2018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居所有发展中国家之首。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变迁也是十分巨大的,它值得我们去总结与反思。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 人口规模 人力资本 快速城镇化 阶层结构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00732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90918.007

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的解释中,社会发展暗含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从相对较低水平向相对较高水平的转变过程。然而,自工业社会到来之后,发展总是被书写为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或者总是被现代化过程所解释^[1]。不管是在宏观社会层面,还是在微观社区与组织层面,中国的社会发展都充满了或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意义,或自下而上日常生活意义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词义表达。

为达到赶超型目标,为摆脱长期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羁绊,为从积贫积弱困境进入国强民富时代,中国在现代化意义上的发展就在客观上表现为在经济增长拉动之下的社会各领域的变化过程。这中间,经济增长又与人口增长纽结在一起。由于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的结构变化,从积累与消费的分配比例上影响着经济增速及其增长方式。所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辩证变化中的人口转型过程。

[1]王元、孔伟艳:《未来30年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及促进共享发展的建议》,〔北京〕《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一、人口规模的扩大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就作为预设变量影响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从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到合作化,再到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三级所有体制的建立,以及城市企业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能够吃上饭”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民安定生活水平与医疗水平,由此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1]。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压力,出现了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为克服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所带来的压力,国家开启了计划生育宣传。最初实行的是节制生育政策,按照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去做群众工作。“文革”时期开始推进晚婚晚育,动员适婚人口在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结婚。到改革开放之后,又进一步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在 1980 年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力图在 2000 年将人口规模控制在 12 亿内。由于这种过于激进的政策出台反过来刺激了突击生育现象,使人口出生率反倒趋于上升。为缓解干群矛盾,政府适时调整了人口政策,将 2000 年人口控制目标从 12 亿调整到 12.5 亿。并在 2000 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法》,以立法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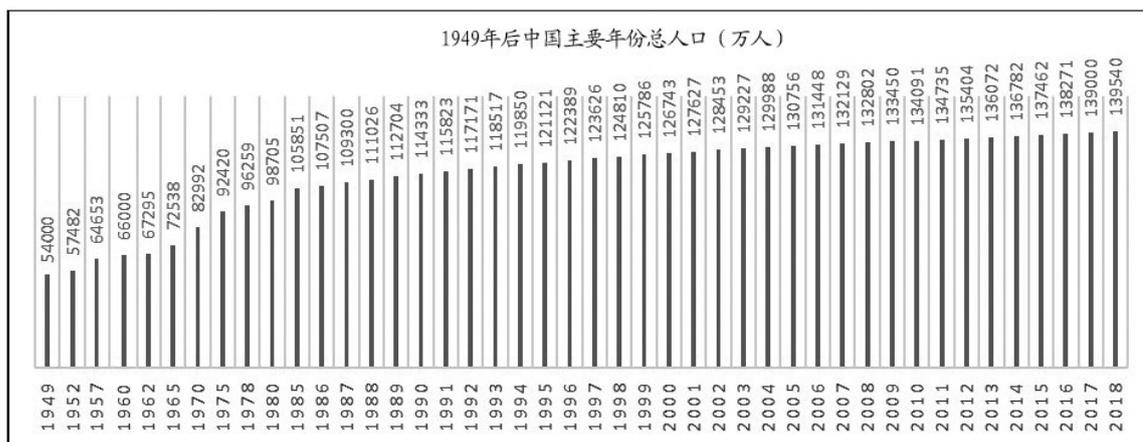


图1 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国人口增长趋势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人口增长方式,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阶段逐步过渡到新世纪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但因受庞大人口基数的影响,每年新增长的人口依旧十分可观。统计显示,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49 年实际人口达到 5.4 亿,到 1960 年达到 6.6 亿;1970 年达到 8.3 亿;1980 年达到 9.8 亿;1990 年达到 11.4 亿;2000 年达到 12.6 亿;2010 年达到 13.4 亿;2018 年年底达到 13.95 亿^[2]。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存在较低的生产效率,土地产出的增量难以供应人口增量带来的粮食消费需求,所以,计划生育就成为解决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需求问题的主要控制变量。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充分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为与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被激发。一方面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长足地增长。另一方面农民也以农民工的身份转变了自己的职业,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经商,这既满足了城市劳动力需求,也实现了农民打工

[1]除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过人口损失外,其他历史时期人口都呈现增长态势。

[2]2017 年及之前人口数字来自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表第 2-1,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 2018 年人口数据来自《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isj/zxfcb/201902/t0190228_1651265.html。

赚钱反哺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与城镇的传统模样。

上述发展开启了中国人对人口消费与生活资料供给之间矛盾的探索,即在“人口论”与“人手论”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至今也未形成普遍认可的理论定论。然而,实践却毫无争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情况下,人多口多吃饭多,粮食产量难以“养活”或“养好”存量人口。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实施,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配置中,在劳动力流动的约束逐步解除后,在户籍制度不得不适时改革后,在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逐步壮大的经济格局中,人口总量的上涨、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却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步。中国在5亿多人口、6亿多人口、7亿多人口、8亿多人口、9亿多人口阶段遇到的粮食短缺问题,在10亿以上人口的增长实践中,几乎未曾遇到——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人口增加同时也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计划经济时期的配给制度,也在改革开放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农村的开放搞活,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方面是农业产量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析出进入城市打工。于是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与外来资本的结合,将中国迅速转变为制造业大国,同时也增加了国际与国内市场的商品供应,这不仅极大改善了消费品市场,并以人口红利增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动力。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41年,中国维持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推进了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迅速降低,在1990年降低到60.1%,在2000年降低到50%,到2017年降低到27%。这就是说,现在,中国用27%左右的劳动就业人员生产的粮食,就养活了差不多14亿的人口,而且还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的食品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在“人口论”与“人手论”争论中,生产关系的改革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持了“人手论”。2017年,中国人均粮食的消费量已经降低到每年约130.1公斤,但肉类消费量却增加到年均26.7公斤,奶类消费量增加到年均12.1公斤,干鲜瓜果类消费量增加到了年均45.6公斤^[1]。

此外,营养状况的改善及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也迅速延长了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仅为35岁,到1957年就延长到57岁,1964年达到64岁。实践证明,只要消除战乱并形成相对公平的生产生活环境,人口预期寿命就会迅速延长。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1990年达到69岁,1996年达到71岁,2005年达到73岁,2010年达到75岁,2015年超过76岁,2018年达到77岁^[2]。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中,女性相对男性呈现了更多生存优势。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0.5岁,男性为66.8岁。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7.4岁,男性为72.4岁。2015年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9.4岁,男性为73.6岁^[3]。这反过来也验证了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共享速度。

二、教育大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最大表征,是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1949年,中国文盲率还高达80%左右。但在合作化、集体化和国有化时期,政府就开始了全民扫盲运动和成人识字率提升运动。各级政府和群团组织在工厂、农村、街道、部队等广泛举办夜校和扫盲班,将识字率的提升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与老百姓的互教相结合、与青年人的发展相结合、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全民集中学习的热潮。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文盲率下降到了6.72%。

[1][2]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表第6-4,表第2-4,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

[3]当前亚洲最长寿国家是日本,其女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7.32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1.25岁。

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国家还大力兴办教育,扩大各级教育的招生规模。统计显示,1952年,全国普通小学招生人数就达到了1149.3万人;但普通初中招生人数仅仅为124.2万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仅为14.1万人,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勉强达到7.9万人。直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全国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上升到1249万人,普通初中的招生人数上升到21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上升到32.3万人,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上升到10.6万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初中以上教育阶段的招生人数还十分有限。进入1960年代,伴随1950年代中前期“人口爆炸”出生人口进入入学年龄,中国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迅速增长,到1965年,普通小学招生人数达到了3296万人;1975年达到3352万人,此后缓慢下降。由于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的影响,学龄儿童的人数开始走低,小学招生人数也开始下降。普通初中的招生人数有了长足增长,到1975年达到1810万人,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也达到了历史性的633.1万人。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影响下,小学教育时间缩短到5年,初中为2年,高中为2年。而且高中结合地方的特点,设计了很多与就业相配套的专业,比如农机班、木工班、铸造班等。受“文革”影响,高等教育停止了招生,于是在1966年之后,其在校人数开始下滑,如1970年只招收了4.2万工农兵学生。很多适龄青年不得不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时期确为高等教育大倒退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另一方面是公社或乡政府对生产大队的控制有所放松,再加上农村家庭和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诱使普通初中招生人数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出现下降趋势。其中,普通初中在1978年招生人数达到2006万的高峰之后,1980年下降到1550.9万人,1985年下降到1349.4万人,1989年下降到1309.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也随之下降,在1978年达到692.9万人的高峰之后,1980年下降到383.4万人,1985年下降到257.5万人,1993年下降到228.3万人。

“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1],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开始平缓上升。因为高中招生人数较少,出现了初中考高中难于高中考大学的局面。大体而言,从恢复高考开始到1997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一直在上升,但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则迅速下滑。比如说,1993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了92.4万人,但当年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却仅为228.3万人^[2]。

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距的拉大,逐渐使农村基础教育趋于薄弱。农村中小学教师文化素质的低下、校舍的破旧失修,以及学生的辍学等现象,使教育问题日渐突出。直到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要普及义务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1986年,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于当年7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采取强制措施保障学龄儿童的受教育权。自此,中国走上了依法治教之路。1992年,国家教育委员

[1]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参加高考,报考条件放宽到1966和1967年的高中毕业生。所以生源年龄差距较大。当年冬天即在各地举行考试,招生27万多人。因为有些人错过了高考机会,于是1978年7月又举行了一次考试,录取40.2万人。77级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则在1978年秋天入学。但这并不是说“文革”期间一直没有招生。事实上,1971年即开始恢复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废除了“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主要招收的是“家庭出身”较好的工农兵大学生。因为生源需具备3年及以上“实践经验”、不受文化程度限制、推荐免试入学且每月发放19.5元伙食费和津贴费,所以“走后门”现象突出,招收的学生学习成绩很不理想,但很多高校和技校在这一时期有所恢复和新建。

[2]这一时期普通初中、普通高中的合并降低了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住校费、学费和书本费的增加,也使一部分收入较低家庭难以为其子女提供必要的学习费用。这从另外一方面降低了普通初中、普通高中的入学率。当然,因为外出打工提供了就业途径,有些家庭还是选择让子女辍学就业了。

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强化了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教育工作。初中招生规模和高中招生规模逐渐回升。初中招生人数在1995年达到1752.3万人，到2000年达到2295.6万人。高中招生人数在1995年达到273.6万人，到2000年达到472.7万人^[1]。

当然，这一时期初中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招生人数的提升，还与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长、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计划生育使子女数减少之后父母亲集中投资子女教育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而且后者可能要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中国家庭一旦有了资金剩余，就会优先将其用于子女的教育。虽然后来大学将毕业分配制改革为自主择业制，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人提供了向上流动机会，这也鼓励了家庭积极投资子女教育。

所以，1990年代中期以后小学和初中招生人数的变化，基本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变化高度吻合。然而，大学的扩招却拉动了普通高中招生人数的增长。统计显示，自1990年到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从60.9万人增加到100万人，到1999年又增加到159.7万人。而2000年则比1999年又增加了60.9万人，达到220.6万人的规模。为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提升全民素质，2002年招生超过320万人，2004年超过447万人，2006年达到546万人，2008年达到607万人^[2]，2014年超过721万人，2018年达到791万人。因为高中招生人数的增速赶不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增速，这使2018年的高中招生人数与大学招生人数极其相近，仅仅为793万人。这是在计划生育使小学招生人数下降的过程中，初中招生人数下降了，随后必然出现高中招生人数下降的结果。

各级教育的发展，迅速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从表1可以看出，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1964年只有416人，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表1 第二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每10万人口中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口(单位:人)

	1964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大专及以上学历	416	615	1422	3611	8930
高中、中专	1319	6779	8039	11146	14032
初中	4680	17892	23344	33961	38788
小学	28330	35237	37057	35701	26779

注:第一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缺失。其他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表第3-6。

时就上升到615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3611人，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8930人。但扩张最迅速的还是“高中、中专”阶段文化程度的人口。正如表1所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该文化程度的人口每10万中只有1319人，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上升到6779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8039人，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4032人。就劳动力人口而言，其素质也有很大提高^[3]。从2006年到2016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年上升到了10.0年。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8年上升到了11.2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了8.5年。2017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GSS全国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1990—2000年出生的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人数所占百分比已经达到47.1%。

有数据表明，至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会达到90%^[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达到50%。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中国教育已经从精英教

表2 不同出生年龄段人口的文化程度(单位:%)

出生年段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学历	总计
1949—1959	82.10	14.20	3.70	100.00
1960—1969	74.60	19.30	6.10	100.00
1970—1979	69.70	16.50	13.80	100.00
1980—1989	52.20	19.50	28.30	100.00
1990—2000	26.20	26.70	47.10	100.00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GSS全国抽样调查。

[1][2][3]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表第3-6,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4]包括职业教育招生人数的毛入学率。

育阶段转变到大众教育阶段。未来的改革趋势,就是将义务教育向下扩展到幼儿园阶段,向上扩展到高中阶段^[1]。如果将免费教育能够向下和向上各拓展三年,并免除学费和杂费,那么,未来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将得到更快的提升。

三、快速城镇化与就业结构的改善

谈到快速城镇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过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人民可以自由流动^[2]的规定;再加之城市经济恢复之后需要一定劳动力的支持,所以出现了一波比较快速的城镇化浪潮。有统计显示,1949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仅为10.64%,但在1960年即达到了19.75%,几乎达到每年增长1%的城镇化速度。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以及农业产量虚报浮夸等因素的影响,也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保障粮食供应,缓解人口增速较快与生活用品增速较慢之间的矛盾,政府采取了生活用品有计划分配的票证管理方式,并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重新“下放”回农村^[3];并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城乡居民划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且明确规定凡农业户口进入城镇需要有城镇录用就业证明。1964年,《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更是明确指出,“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政策”,并将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口限定为不超过现有非农业户口人的1%。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城镇化水平逐步降低的趋势。即1965年降低到17.98%,1970年降低到17.38%,1975年降低到17.34%。

为缓解农民生活压力,在1970年代前期,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保留部分自留地,也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附近的城市或集镇“搞副业”。这些农民工就成了第一代农民工的主体。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步伐。虽然依据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水平不高,但依据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水平连年上升:1980年达到19.39%,1990年达到26.41%,2000年达到了36.2%,2010年达到49.95%。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年均提高在1.2%以上。这使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将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城镇化率提升到新水平,即到2018年达到了59.6%左右。

现在,户籍制度虽然存在,但在不同城市中已进行了不同的改革。在因城施策、分类推进的政策配置中,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已逐步放开了落户限制。但农民对农村土地的热爱,以及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建设的完善,却逐步淡化了城市户籍的吸引力。实践证明,只要城镇化过程能够坚持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只要乡村振兴能够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理念,那么农民就不会看重非农户口的价值。现在,反倒是非农户口的人很难将自己的户口再转变为农业户口。从这里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城镇化的有力推进,让中国迅速从村落社会转型为都市社会,从定居生活转型为迁居生活,从自

[1]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当年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费和杂费;2007年免除了教科书费;2008年免除了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和杂费,免除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

[2]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迁徙与居住自由。

[3]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简非生产人员。1961年城市净减职工873万人,城市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1962年7000人大会议后又提出精兵简政的口号,在1962和1963年推进了人员精简工作,使1963年全国职工人口比1961年减少1887万人,全国城镇人口比1961年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比1961年减少280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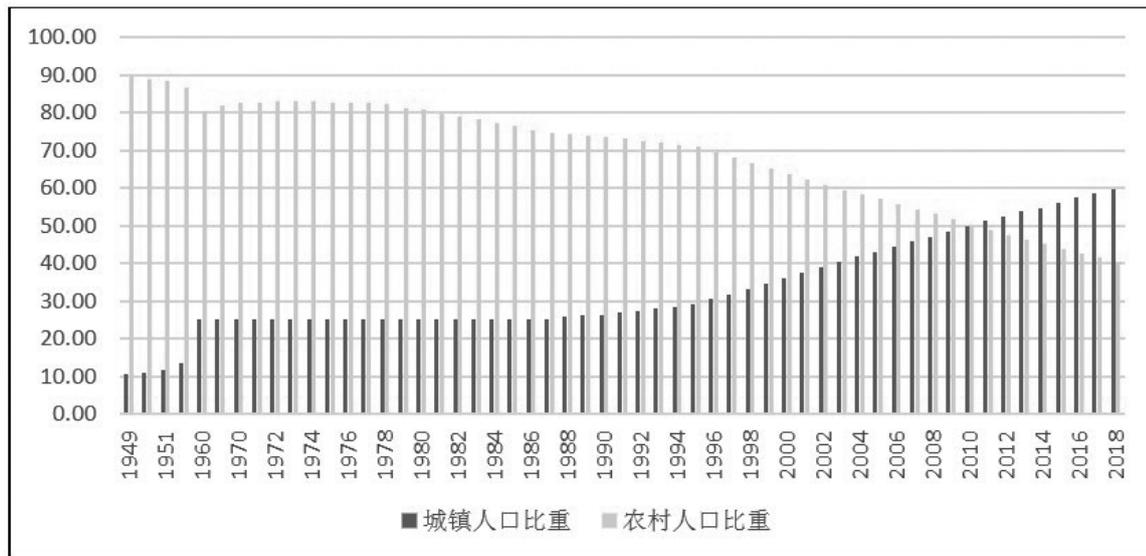


图2 新中国成立70年城镇化趋势

给半自给社会转型为市场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对人类最有进步影响意义的大事件。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过程,而且还深刻体现着城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农村的积极影响过程。中国的城镇化,不但比较顺利解决了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使1亿多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使1.8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而且还顺利解决了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尽管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这一问题解决得还不够理想,但在“两为主”(教育经费以财政投入为主,上学学位以公立学校为主)的制度规约下,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子女有学可上。

此外,可携带可转移的社会保险政策,也使农民工获得了与城市劳动力一样的权利,能够在流入地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会在2020年超过60%,在2035年超过75%,在2050年达到80%。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质量,提升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也为世界人口的城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以农民工为主的城镇化浪潮,同时也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的就业结构,使劳动力人口首先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流动到第二产业,然后再向第三产业流动。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83.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仅占7.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占9.1%。之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迅速提升了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降低到70.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加到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到12.2%。

尽管如此,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是特别大。正如图3所示,1990年温饱型小康社会实现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就降低到60.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就上升到21.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上升到18.5%。尽管1960年代中期以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曾高于第二产业,但一直到1994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才又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人员所占比重达到23%。此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增速长期快于第二产业,强化了后工业化的特征。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的最重大的就业结构变迁。在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服务业的需求开始越来越大,中国在转变为制造业大国之后,开始向服务业大国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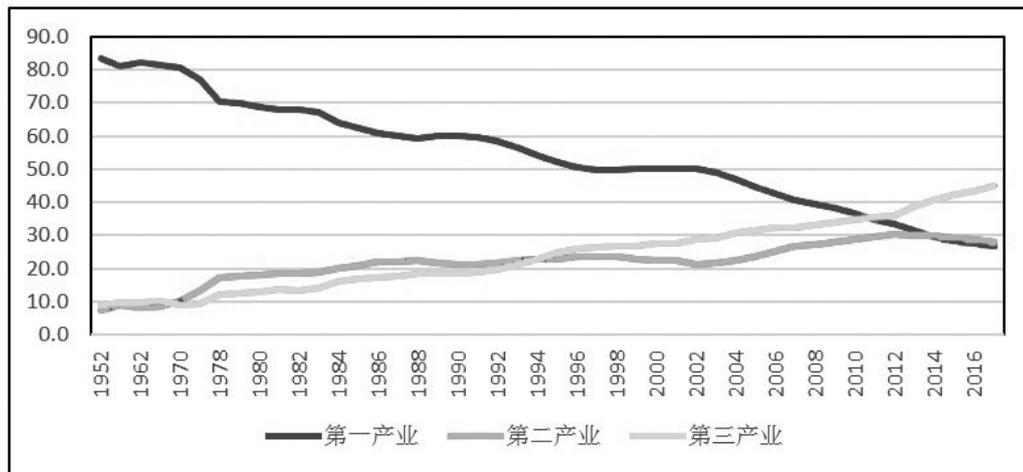


图3 新中国成立70年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人员占比(单位:%)

另外,农业现代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与化肥的使用,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逐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这强化了城市对农村中年轻劳动力的拉力。总之,在中国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直线下降。2000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50%左右,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22.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7.5%。2010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36.7%,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8.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34.6%。

到2011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从业人员占比发生第二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第二位的24.8%,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9.5%;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35.7%,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这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对第一产业的完美超越。

2015年,中国劳动力从业人员占比的结构又发生了第三次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第一次低于第二产业,降低到28.3%,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9.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42.4%。201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继续降低到26.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27.6%,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却上升到46.3%。在第三次转型中,继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下降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也开始显著下降。

可以预见未来,伴随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机器人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会逐步降低。后工业化浪潮将最终把这个社会带入机器与人结合的“人机社会”。“人机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的减轻,而闲暇和消费时间的延长。因此,“人机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还会大大拓展。

四、阶层结构优化与消费结构升级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长期呈现的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特征。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也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农业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并借此取得生活资料,因此在整个社会中,农民阶层是主要社会阶层。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为基础的经济与组织方式,被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所代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什么时候生产,都是农民自己说了算,由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为解决收入问题,农民先是在农闲时节外出打工,接着便驻扎在进入的城市长期务工成为农民工。就这样,农民在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将自己转变为工人阶层的同时,也教育子女通过参加高考转变为“国家干部”“非体力劳动者”

或“白领劳动者”。这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在工人化和中产化两条道路上并行,并在2000年前后成为名正言顺的“产业工人”。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流动与阶层结构转型,与西方有重大区别,西方是先迎来工业化并形成庞大的工人阶层,然后在“二战”之后才迎来后工业化,并将工人阶层转变为“中产阶层”。但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大城市走向后工业化的同时,很多省会城市(即“二线”城市)还延续着工业化——表现为同一时空中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也表现为同一时空中大规模的、并行不悖的工人化和中产化。

正因为存在并行不悖的双重社会转型特征,中国才比较好地解决了社会转型中存在的均衡发展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转型带来的社会冲突,维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也就是说,具有东方渐进改革特征的制度变迁,以利益诱致方式通过增量改革造就了体制外的经济与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个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态势,并以农民工的辛勤劳动比对城市工人的权利保护,以价格双轨制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建构不同的改革逻辑,最后完成市场经济的一体化改造。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完成,但民营企业却以市场化的草根性增长成功占有了重要份额,成为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主战场。有统计显示,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50%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占有了技术创新和新产品70%的比重,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也超过90%。

总之,经济的多元发展格局,推进并完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现代化任务。199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目标。2000年实现了总体性小康目标。之后又将“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持续发力,使民生建设登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迅速提升了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71.2元,其中城镇居民为343.4元、农村居民为133.6元。2000年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3721.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6255.7元,农村居民为2282.1元。2010年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2519.5元,其中城镇居民为18779.1元,农村居民为6272.4元。到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8228元,其中城镇居民为39251元,农村居民为14617元。

依照2010年2300元不变价格确定的贫困线,在改革开放之初,即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高达97.5%,但到2000年就下降到49.8%,到2010年下降到17.2%,到2018年下降到1.7%。即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也下降到差不多只有1660万人。按照联合国2%的贫困发生率标准,可以说在2010年2300元不变价格的基础上,中国目前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可以说,精准扶贫工作的重大成功,缩小了社会阶层中的贫困人口规模,支持了社会阶层的优化过程^[1]。这也使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GSS的抽样调查,在劳动力人口中,雇主阶层所占比重为4.93%,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为12.83%,新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为23.22%,工人阶层所占比重为31.28%,农民阶层所占比重为27.74%。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一个以农民阶层为主的国家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阶层的队伍,也开始在后工业化过程中收缩,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一直处于持续性扩大之中。其原因是在国内与国际形势影响下,中国加速了“去工业化”的步伐,这使一部分本应该在工人阶层的就业人员,进入了中产阶层的队伍。尽管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焦虑与脆弱的,即虽然居于职业划分的中产阶层,但他们还没有形成认同中产的心理结构,比如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担忧,以及职业生涯与收入水平的相对剥夺感,使他们处于变动不居的心理状态;但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使中国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国家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国家转变,也是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消

[1]李强、杨艳文:《“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研究的创新之路》,〔北京〕《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2期。

费结构随之而迅速升级^[1]。

众所周知,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阶层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为生,而且经常处于饥饿威胁之中。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时间,由于农业部门的低效率,也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水平与机械化程度的低下,粮食单产长期低

表 3 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趋势(单位:%)

年份	雇主阶层	老中产阶层	新中产阶层	工人阶层	农民阶层
2001	2.78	10.61	6.79	28.21	51.61
2006	3.15	11.51	7.77	30.61	46.96
2010	3.66	11.03	12.68	36.21	36.52
2013	4.62	13.85	15.74	35.46	30.32
2015	5.06	14.92	18.91	32.79	28.32
2017	4.93	12.83	23.22	31.28	27.74

数据来源: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GSS调查。

迷。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粮食供应都处于短缺之中^[2]。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只有率先在农村取得重大突破,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市场供给,满足人民生活之所需,票据制度才能伴随市场商品的丰富而走下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提高,由此也解决了中国长期“吃不饱”的问题,引发了经济特区深圳率先闯关,取消粮票,利用价格机制调控粮油分配,形成了市场需求制。自此开始,中国的消费品市场逐渐从短缺阶段过渡到充足供应阶段。

总之,经过 70 年来的发展,在中产阶层占比迅速提高之后,中国人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恩格尔系数为例,1949年,中国城市用于食品消费占比就高达 60.2%。在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1957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 58.4%,农村仍然高达 65.7%;1979年城市为 57.5%,农村为 64.0%;2000年,城市下降到 39.2%,农村下降到 49.1%;到 2010年,城市为 37.5%,农村为 41.1%。进入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在所有家庭消费中,用于食品方面开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到 28.4%,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将主要的消费转移到教育、卫生保健、旅游、住房改善等方面。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也已经从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和多样化、定制化转变。

从食品消费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的粮食消费量较高,为家庭人均 247.8 公斤,1980 年增长到 257.2 公斤,1990 年增长到 262 公斤。此后到 1998 年下降到 249.3 公斤。但猪肉、羊肉、牛肉的消费量却逐步增加,1978 年农村家庭平均每人的年消费量为 5.7 公斤,1990 年增长到 11.3 公斤,1998 年增长到 13.2 公斤。进入新时代之后,2013 年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粮食消费量降低到 178.5 公斤,2017 年又降低到 154.6 公斤。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肉类消费量在 2013 年增加到 22.4 公斤(包括了猪肉、羊肉和牛肉),2017 年增长到 23.6 公斤。

同样在食品消费中,城镇居民家庭年粮食人均消费量迅速下降:1985 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134.7 公斤,1990 年下降到 130.7 公斤,1998 年下降到 86.7 公斤。但对猪肉的消费量却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态势,在 1985 年家庭人均消费量为 16.7 公斤,到 1990 年增长到 18.5 公斤,到 1998 年降低到 15.9 公斤。牛羊肉的人均年消费量,在 1985 年仅仅 2 公斤左右,到 1998 年增长到 3.34 公斤。进入新时代以后,城镇家庭人均年粮食消费量,2013 年降低到 121.3 公斤,到 2017 年降低到 109.7 公斤。但肉类年人均消费量却持续增长,2013 年增长到 28.5 公斤,2017 年增长到 29.2 公斤。

从耐用消费品上来说,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在 2000 年之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仍然将“呢大衣”“毛毯”“大衣柜”“沙发”“自行车”“缝纫机”等作为家庭耐用消费品。比如说,在农村家庭中,

[1]张翼:《社会新常态:后工业化社会和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改革开放之前,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根据工分与生产队粮食产量分配(完成公粮征缴任务之后)粮食。城市以粮票方式管制消费,一般县机关干部每月 26~28 斤,公社或乡干部 33 斤,居民 23~26 斤,大学生 33 斤,中学生 22~24 斤,工人特殊工种 45 斤,重体力 37~40 斤,一般工人 30~33 斤。每月肉票 1 斤。

每百户家庭的自行车拥有量,1978年仅30.1辆,1998年上升到137.2辆;每百户的缝纫机拥有量,1978年为19.8台,到1998年增长到65.8台;每百户的手表拥有量,1978年为27.4只,1998年增长到154.6只。在城镇每百户家庭中,1998年的呢大衣拥有量为191.1件,毛毯拥有量为142.1条,大衣柜为84.0台,沙发为207.6个,自行车为182.1辆,缝纫机为56台。进入新时代之后,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等所谓的“老三大件”都已经充分满足了需要,已经很难将这些消费品当作耐用消费品了。从“新三大件”,即家用汽车、移动电话和计算机来说,在农村每百户家庭中,2013年家用汽车拥有量为9.9辆,到2017年增长到19.3辆;2013年移动电话拥有量为199.5部,到2017年增长到246.1部;2013年计算机每百户拥有量为20台,到2017年增长到29.2台。在城镇每百户家庭中,2013年家用汽车拥有量为22.3台,到2017年增长到37.5台;2013年移动电话每百户拥有量为206.1部,到2017年增长到235.4部;2013年计算机每百户拥有量为71.5台,到2017年增长到80.8台。

从家庭住房面积上来说,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仅8.1平方米,到1990年增长到17.8平方米,到1998年增长到23.7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面积,1978年仅为3.6平方米,到1990年增长到6.7平方米,到1998年增长到9.3平方米。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5.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6平方米。到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7.3平方米^[1]。

中产阶层的扩大与消费市场的扩展,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营养条件,减轻了劳动强度,提升了人均预期寿命。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从投资驱动阶段过渡到消费牵引阶段。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中产化社会,第一次进入网络社会,也第一次进入汽车社会。这些变迁,将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造成极其强烈的影响。

当然,在这些变迁之后中国的发展,将在未来不可避免地进入人口负债阶段。比如老龄化水平开始迅速提高。截至2018年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7.9%,65岁至7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提高到11.9%。中国在经历“十三五”时期较缓的老龄化速度之后会进入到“十四五”时期的快速老龄化阶段。此外,青年人的结婚率开始降低,离婚率仍然在上升。初婚年龄连年推迟的结果是降低了人口出生率。这些都迫使我们思考如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以缓解劳动力老化的影响。我们认为,只有迅速发展科技、开发自动化设备与人工智能设备,扩大机器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才能最终解决未来的劳动力需求。也就是说,只有继续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研体制改革,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尽快形成创新力量。再比如,城镇化率在日益增长,可城镇化质量还需进一步改善^[2]。如果农民工仍然被视为流动人口、被视为劳动力人口、难以被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险保护网、难以被视为城市的新公民,则其社会认同问题就难以解决。还有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仍然是一个脆弱的阶层,在城市生活成本迅速上升与工资收入渐进增长的矛盾中,他们还需要克服房贷压力才能真正将自己转变为内需的拉力。总之,社会转型只有伴之以顺利的社会发展,才能化解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群体区隔,形成新时代需要的社会黏合力,把中国引向光明未来。

[责任编辑:方心清]

[1]2000年之后中国房地产以建筑面积计算。2018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http://www.stats.gov.cn/tjzc/zthd/sjtjr/d10j/70cj/201909/t20190906_169319.html。

[2]徐延辉、龚紫钰:《社会质量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成都〕《经济学家》2019年第7期。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t 70 Years

Zhang Yi

Society is made up of a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is first manifested by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size and the change of employment area, followed by the emergence of the magnificent urbanization and the three changes of employees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finally the expansion of housing area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lass structur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mobility channels, China has also transformed from a shortage economy to a surplus economy and from an impoverished society to a well-off society. A major result of this series of development is the extension of schooling years and the increase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of Chinese people. China has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the popularized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to a stage of the popularized higher education as a whole, and has also shifted from a stage characterized by low life expectancy in the earl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at by high life expectancy. In 2018, the life expectanc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s reached 77 years—the top one among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hort, the past 70 years have seen China going through social development of world interest and great chan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worth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Stages, Achievements and Less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u Linhai Li Zhuang Niu Liangy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positioni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penness, the present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od industry in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sums up the major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In terms of lessons: First,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people's rice bowls and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insist that Chinese people's rice bowls be firmly in the hands of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 and food supply be steadily guaranteed. Second,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shift in the main contradiction, China shoul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quantity safety and quality safety, promoting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quantity guarantee to quality guarantee. Third,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China shoul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gradually identify the industrial positioning of food industry, implement positiv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ies, guide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opennes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so as to maintain both the market attribute of food industry and the social attribute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dustries. Fourth, since the core technologies are not for sale in the market, and since both food quantity safety and food quality safety know boundaries, China shoul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pendent innovations and imported technologies. While absorbing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world food industry, China must seize the initiative i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food industry.